清史研究前沿·清代秘密社会

太平天国何以兴起

——基于洪秀全早期思想的新考察

刘 晨

[摘要] 太平天国文献所记1837年洪秀全“丁酉异梦”的内容掺入了新形势下洪秀全本人及太平天国对之前梦境的重新解释，脱离了原始情况，且各种文献之间有着互相印证神性的意义。“诏明”于1848年冬的《太平天日》是一部完整的宗教神话，同时是一篇反清宣言，结合其他史料，说明至此时洪秀全等人才正式立意反清。屡试不第、广西传教受挫、广州入教受洗被拒等经历使洪秀全产生了对现实社会的极度不满情绪，紫荆山拜上帝组织的发展则对他自认受命下凡、斩邪留正的理想给予了鼓励，1847年夏二次入桂后，洪秀全的主观认识有了明显变化。现存文献所反映洪秀全思想转变与反清思想确立的时间点恰好与广西局势的崩溃相吻合，从侧面说明激剧恶化的社会生态驱策洪秀全最终走上反清之路。

[关键词] 太平天国 太平军 洪秀全 拜上帝思想

[中图分类号] K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4）－04－0044－16

洪秀全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发起者，他的早期思想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理论基础。洪秀全的思想内涵丰富复杂，变化剧烈，深受学界关注。但迄今专门研究洪秀全思想的论作不多。对洪秀全的早期思想，王庆成曾刊文重新评价，认为其经历了从追求功名，以道德说教手段改造世道人心，到立志反清的发展过程；1843年皈依上帝是其思想异端的开始，但不是反清的标志。夏春涛详细考察了上帝教的教职、教义、教仪，并从宗教视角剖析太平天国的内政外交及“天国”陨落的原因。崔之清等著《洪秀全评传》探讨了洪秀全思想结构的基本层面及其变异脉络。[①]

先行研究为我们了解洪秀全的早期思想提供了基本框架，从人物思想的角度探讨太平天国也提供了视角和方法论上的有益借鉴。但还有一些有待推进的问题：洪秀全的“丁酉异梦”是

[收稿日期] 2023－05－29
[作者简介] 刘晨（1986— ），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北京100871，sdbzliuchen@126.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群体性事件与官方治理研究”（20CZS038）。

① 王庆成：《论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发展》，《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2页；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崔之清、胡臣友：《洪秀全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否属实，《劝世良言》何以能引起洪秀全的思想共鸣？洪秀全的早期思想特质是什么，他是否虔诚地信奉上帝，是否具有现代性的平等观？拜上帝思想是如何丰富和发展的，对太平天国治乱兴衰产生了什么影响？洪秀全是如何走上反清道路，太平天国运动又是如何酝酿并发动起来的？为什么会发生在广西金田？太平军将士何以会毫无畏惧地献身反清运动？在厘清太平天国开国史上一些关键史实的基础上，还需要对这些关系总结太平天国成败得失的重要议题做进一步讨论。

一、《劝世良言》与洪秀全“丁酉异梦”

太平天国运动肇始于洪秀全的一场“异梦”。在太平天国官书文献中，目前所见关于“丁酉异梦”的最早叙述，是在1845年洪秀全所作《原道救世歌》中，有“予魂曾获升天堂，所言确据无荒唐”一句。[①] 在后来《太平天日》（1848）、《天兄圣旨》（1848）、《太平天国起义记》（1852）、《奉天诛妖檄》（1852）、《三字经》（1853）、《御制千字诏》（1854）、《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1860）、《钦定英杰归真》（1861）中都有提及洪秀全于丁酉年（1837）三月病中升天一事。

1847年3月，洪秀全与洪仁玕到广州美国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I. J. Roberts）处学道，并将他获得和阅读《劝世良言》的经过、心得及病中之梦幻异象向罗做了陈述。罗孝全在3月27日给友人巴克（W. Buck）的信中写道：“他见到了天使的景象，天使向他指点迷津，教他一些他以前并不知道的东西，其中有些他似已部分领悟，另一些他承认还不知道其意义。但他所说的这些内容都是《圣经》中所记载的。”[②] 罗孝全还说：“他所讲其异梦的内容令我不解，至今仍不知道是从何处得到这样的信息，因他对《圣经》的知识了解不多。”[③] 结合公私著述，我们基本可以认定洪秀全在1837年落第后的大病中产生了异梦异象是个事实。

至于梦象的内容，自然不像洪秀全后来在《太平天日》中宣布的那样神乎其神，更不可能有洪秀全奉天父之命下凡诛妖的情节。因为罗孝全对他的述说虽然不信，但也没有予以斥责和反驳。据现有资料，异梦的情节主要记载于《太平天日》《天兄圣旨》《太平天国起义记》《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现存这四种文献的版本，《太平天国起义记》是1852年流亡香港的洪仁玕之口述。其他三种均刊行于1860年以后，如《太平天日》虽标明“诏明于戊申年（1848）冬”，但实际是在1862年即太平天国起事12年后才正式刊刻。因此，它们所记“丁酉异梦”的内容必然掺入了新政治形势下洪秀全及太平天国对20多年前梦幻梦境的重新发明和解释，也必然增添了政治内容，脱离了原始情况，而且各种文献之间实际还有着互相印证神性的意义。

《太平天国起义记》的创作时间略晚于《太平天日》，却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叙述洪秀全早年经历。洪仁玕当时远在香港，受起事后洪秀全神学思想干扰的程度较少。比如他不言洪秀全梦中所见为“天父”“天兄”，而称之为“一老人”“一中年”，比较接近当时的实情，因为1837年洪秀全还没有阅读《劝世良言》，不具备基督教知识。洪仁玕也没有提到后来洪秀全丰富了的

① 《原道救世歌》，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3页。

② 夏春涛：《有关太平天国的西文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86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58页。

③ W. H. Medhurst, “Connection between Foreign Missionaries and the Kwang-se Insurrection,” *The North-China Herald*, Vol. Ⅳ, No.160 (Aug. 20, 1853), p.11；罗孝全：《洪秀全革命之真相》，简又文译，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第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824页。

“天妈”“天嫂”“天妻”“天儿”形象，没有孔子遭鞭挞的情节，说洪秀全登天看到“一龙”“一虎”，左青龙右白虎辅佐君王的模式符合传统中国民俗。洪仁玕的口述还补充了一些其他文献不载的细节，如洪秀全发病后家人请来巫师作法驱鬼，将全家目前的不幸归咎于风水先生所选祖坟地点不吉利。所以《太平天国起义记》所记洪秀全异梦景象，相对而言更为原始、朴素和真实。它还准确明了地捕捉到后来诞生的太平天国思想之三条主旋律，也是太平天国维系统治的核心原则：“迷信上帝”，“反孔非儒”，以及由迷信上帝衍生而来的“废除私有”（“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①]

1843 年，洪秀全带着对科举入仕的眷恋，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踏上赴广州应试的征程。然而，还是名落孙山。同年，他到莲花塘表兄李敬芳家中设馆教书。循着既往的人生轨迹，如果洪秀全没有读到《劝世良言》，或许他的科举应试之途还要继续。一个偶然，李敬芳于洪秀全藏书中看到《劝世良言》，向洪秀全借阅，读后极力向他推荐此书，并称内容奇异。洪秀全这才仔细阅读了《劝世良言》，始有感悟。这是他接触基督教的开始，也是放弃科举入仕之梦、皈依上帝的开始。

洪秀全之所以能与《劝世良言》产生强烈的思想共鸣，主要有两点原因：

第一，原本与现实毫无联系且情节荒诞、没有逻辑可言的异梦景象竟然与《劝世良言》中的内容相互印证，使洪秀全有了解释六年前梦境的文本依据。他“寻得解释其六年前病中梦兆之关键，觉书中所言与其梦中所见所闻相符之处甚多。此时彼乃明白高坐宝座之至尊的老人而为人人所当敬拜者非他，即天父上帝是也；而彼中年人曾教彼助彼诛灭妖魔者，即救主耶稣是也；妖魔，即偶像；而兄弟姊妹，即世间人类也”。洪秀全如梦初醒，奉若至宝，“其确信梦象与全书均为真理，而彼自己确为上帝所特派以拯救天下——即是中国——使回到敬拜真神上帝之路者”。[②] 这种内容上的吻合纯属巧合，却坚定了洪秀全接受上帝使命下凡救人的信念，给予他极强烈的心理暗示，并成为支撑他以后 20 年人生的精神动力，也反映了洪秀全此时原始朴素的思想形态，与后来矫饰为天父之子、天兄胞弟的神话故事大不相同。

第二，《劝世良言》批判的内容恰恰就是令洪秀全深恶痛绝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社会风气。《劝世良言》一方面批评文恬武嬉、吏治腐败、富宦不仁的社会流弊，一方面通篇反对拜偶像邪神，强调拜孔子、文昌毫无用处。这使洪秀全联系个人长期求取功名的挫败经历，愈加对科举制度怨艾、愤懑、心灰意冷，并产生了以此“良言”劝救其他迷雾中人的想法。

《劝世良言》诊断的中国社会病症源于人性原罪，即世间之人“一脱娘胎就有恶性之根”。所以以上帝信条救人是第一要务，“倘若全国之人，遵信而行者，贫者守分而心常安，富者慕善义，心亦常乐，上不违逆神天上帝之旨，下不干犯王章法度，不独贪慕世乐之欢，不空费光阴之宝，君政臣忠，父慈子孝，官清民乐，永享太平之福，将见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清平好世界矣”。[③] 可见它的药方是要求世人遵守“上帝之旨”和“王章法度”双重指标，并不鼓动人们批判现实政治。

另外，马礼逊《圣经》译本的文字晦涩难懂，涉及的基督教教条、名词和故事对中国读者来说是陌生的，而《劝世良言》并不系统地宣讲基督教条文，只是在 60 多个互不连贯的章节中摘引某些片段，加之梁发援引儒家经典予以阐释，以及穿插了一些对广东社会风情的描述，这

① 《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 410 页。

②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简又文译，《太平天国》第 6 册，第 846、848 页；巴色会档案，《韩山文的半年度报告》，1853 年 7 月至 1854 年 1 月，巴色会档案馆藏，档案号：A–1.2（1853），47。

③ 梁发：《劝世良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39号，中华书局，1979年，第 2、100 页。

些都使洪秀全易于理解和接受。

因此，洪秀全通过《劝世良言》掌握的基督教知识是最基础的，甚至是有所变异的，他对《劝世良言》的认识水平也不可能超越宗教的界限而达到政治反抗的高度。洪秀全开始拜上帝，并不意味着开始了反清行动。从接下来洪秀全的实践看，1843 年阅读《劝世良言》后，洪秀全已由一个眷恋仕途、心系功名利禄的传统士子转变为一名虔诚的上帝信徒和上帝福音（当然是洪秀全所理解的）的传播者。他发展的最早信徒洪仁玕，直到 1849 年还去参加科举。这说明当时洪秀全发展的是致力于拜上帝的信徒，不是反清的骨干。至于蓄志反清的意识，以及系统的拜上帝宗教理论，则是洪秀全及他的信徒们在早期宗教活动中随着势力的扩大逐渐形成的。

二、早期宗教活动与拜上帝思想的发展

洪氏亲族和至交均是洪秀全丁酉大病的见证者，他们率先皈依上帝，不加反对，说明他们是相信洪秀全的梦幻和异常举动是具有神奇神秘色彩的，进一步说明洪秀全生病及病中病后出现异样的事实。也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洪秀全等人是虔诚地信奉《劝世良言》中所宣传的上帝。信徒们经常围聚在一起，宣读和研究《劝世良言》，“读至洪水泛滥，所多马城之毁灭及末日审判诸段，彼等皆生恐怖，不知此等灾劫果再临否”。当齐声诵读《旧约·诗篇》第 19、第 33 篇之信奉上帝“可挽回人灵心”“使愚者得智”“可乐人心”“可明人眼”等句时，信徒们便会体会到精神上的欢快和心灵上的净化。洪秀全还同李敬芳制造了两柄“斩妖剑”，各佩其一，准备仿照《劝世良言》引述的景象持剑斩妖伏魔。一次，洪秀全与温姓朋友交谈《劝世良言》，温姓不信，洪秀全竟不顾温姓设宴款待的盛情，拂袖离去。当别人借阅《劝世良言》时，洪秀全坚决不允许旁人在书上私自改动或旁注，他非常尊崇此书，坚信“神爷火华之言乃正”。① 这些事例均说明洪秀全和信徒们并非借上帝之名行个人野心，他们没有私心杂念，洪秀全更是深信自己接受了上帝启示，担负着宣传上帝真理、贬斥偶像、拯救世人的神圣使命。当然后来的历史实践证明，这并非一条真理之道。但当时洪秀全等人正是怀着这种虔诚淳朴的心态，开始了最初四出布道的宗教活动。

1844 年 4 月至 11 月，在粤桂两省的出游，对洪秀全来说是一段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宝贵经历。洪秀全了解了更多的社会现实，丰富了人生阅历，积累了布道经验，对自己在《劝世良言》中领会的基督教有了更系统、更深入的认知。这段出游经历和接下来两年多的居乡生活为洪秀全静下心来创作自己的宗教作品和宗教理论提供了时间。

出游广西期间，洪秀全创作了《原□□经》《劝世真文》《百正歌》《改邪归正》等 50 余种。回到花县后，他一边教书谋生，一边继续布道，又陆续写了一些宗教诗文，但大多现已散佚，只有《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几篇存世，成为我们研究洪秀全出游广西及其后居家这三年间思想情况的最直接资料。②

《百正歌》是 1844 年洪秀全在广西布道时的通俗性宣传材料。全篇 400 余字，前后共 60 个“正”字，故约计而名“百正”。所谓“正”，洪秀全认为是“正道”，即为人正（身正），文中并未说明具体指标，只是以历史人物为例，强调君臣、父子、夫妇、男女各色人等俱要守本分、明善恶。他认为古代先贤中的尧、舜、禹、稷、周文、孔子等是“正”的典范，故受历代尊崇，

---

①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 6 册，第 848–850 页；梁发：《劝世良言》，《近代史资料》总 39 号，第 43 页。

② 《洪秀全来历》，《太平天国》第 2 册，第 689 页。按，太平天国将《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合辑为《太平诏书》刊行，见《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 10–23 页，以下该书引文不再一一注明。

而桀、纣、齐襄、楚平、隋炀等俱因不正而遭厄运。《百正歌》全篇充满了浓厚的儒学思想，没有批评孔子，也没有任何反清说教，仅有几句诗歌，如“能正可享天堂福，不正终归地狱境”，提到了《劝世良言》中“上帝”“天堂”“地狱”等词，而这些词也被赋予“修身正己”的儒学色彩，旨在针砭社会流弊。对于一个刚刚零星接触基督教教义，却受过20余年儒家经典教育的中国士子来说，完全摒弃儒学思想的束缚实非易事。

《原道救世歌》写于1845年。它继续阐释《百正歌》提出的“正”与“不正”，提出了“正”的行为准则和“不正”的具体标准，如“正”即孝亲、忠厚、廉耻、仁义、非礼四勿、知命安贫等，“不正”即淫、忤、杀、盗、巫、赌、烟、酒、堪舆、相命等。这反映了洪秀全的道德观，部分内容成为后来太平天国移风易俗的社会政略，如洪秀全提出“第一不正淫为首”，故太平天国长期厉行男女分营的制度。这些观念旨在“救人”——“脱俗缘，莫将一切俗情牵，须将一切妄念捐”，仍然是以儒家的道德标准宣扬《劝世良言》中的人性原罪论。

《原道救世歌》提及“天下一家”概念，这是洪秀全早期思想的发展。其中“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一句提出天父上帝是天地人万物的创造者，无论中外，人人都应拜上帝。中国古代无论是思想家还是民间，都不缺乏天下一家的说法。但洪秀全所说的“天下”已不是传统概念的中国，而是具有了朦胧的世界意识、世界观念。“开辟真神惟上帝，无分贵贱拜宜虔”，“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是讲自君王至庶民，不分尊卑贵贱，同样应尊敬崇拜上帝。“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是讲人人都是上帝子女，灵魂都是上帝所赐，不应自相残害。

洪秀全提出的观点，均可在《劝世良言》中找到依据，无非更加具体形象和本土化。梁发也强调“天下一家”，但他同时认为“且世界上万国之人，在世人所论，虽有上下尊卑贵贱之分，但在天上神父之前，以万国男女之人，就如其之子女一般”，“在神父之前，不论异民与如大之人，有受损割与未受损割之人，蛮夷与西氏亚之人，奴仆与家主各人，都不分别。惟独属于耶稣基督者，在宇宙之内，凡所有诸物，皆满足其心，遂其灵魂之志。故在世界之上，则以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一般，并无各国之别。独由耶稣基督之恩，而作万物赐于诸人需用，因神天至公义者，不轻此而重彼，以全世界之人，皆一家也”。[①] 洪秀全显然认同梁发的思想，他们强调的是人性原罪的平等、人人敬拜上帝的权利和义务的平等，目的是劝人信教，强调天父上帝是古今中外独一真神的地位和权威。

无论是梁发还是洪秀全，他们都承认世俗社会里上下尊卑、贵贱善恶之分，也都没有想过破坏现实社会中等级制的社会结构。洪秀全后来的反清实践是为了实现等级秩序内部的循回轮换，他后来的一切著作和政治实践，以及太平天国的一切文献和政略方针，都没有体现现代意义上的平等观。比如，不在太平军中和政府中的普通百姓都被唤作“外小”而非“兄弟”。[②] 即便是在宗教领域，在上帝面前，子女们仍然大小有别、等级有差。如果说洪秀全为了传教布道和后来动员民众参加反清的需要，曾经刻意渲染宗教权利的平等，故意同现实社会的平等概念相混淆，那在金田起义洪秀全登上太平王宝座之后，特别是定都天京之后，此类关于平等的说教在现实社会中愈来愈淡薄直至杳无踪迹。所以，相对意义上的“平等”宣传不过是动员起事或发展起事的工具，并非洪秀全思想的本真。

同样是写于1845年的《原道醒世训》，对“天下一家”的观念作了进一步阐释，洪秀全讲：“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

---

① 梁发：《劝世良言》，《近代史资料》总39号，第38、135页。

② 臧谷：《劫余小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太平天国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83页。

可起尔吞我并之念”，“惟愿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跳出邪魔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时凛天威，力遵天诫，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相与作中流之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应效仿“唐虞三代之世，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涂，举选尚德”的“大同”“大道”。文中引用了孔子关于“大同社会”的描述，来源于《礼记·礼运》。梁发的《劝世良言》也有类似描述，如人人肯行上帝倡导的体恤孤寡、济危扶困、患难相救、乐善好施的“正道”“公道”，则“君政臣忠，父慈子孝，官清民乐，永享太平之福，将见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清平好世界矣”。[①] 洪秀全热烈歌颂和心仪的理想社会之蓝本显然杂糅了传统儒学思想和《劝世良言》转说的基督教思想，但儒家思想更为浓厚，基督教思想较为淡薄。这是由洪秀全和梁发的人生阅历、家庭背景、文化和知识结构不同所决定的。

《原道醒世训》的阐述表明洪秀全的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首先，洪秀全对社会病症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社会流弊的批判更为强烈，他将《原道救世歌》中对每个人的宗教说教、道德说教，升华为改造社会的理想。其次，相比于《劝世良言》,《原道醒世训》突破了基督教宣扬的以现实社会中的安贫乐命换取精神升华和死后荣光的说教，直接提出要以公平正直的现实社会取代当下凌夺斗杀之世，这是后来确立的建立人间“小天堂”思想的雏形。但是，洪秀全的思想始终没有跳出《劝世良言》的窠臼，他提出需要改造社会，却找不到改造社会的新方案，只能理想化为上古三代的大同社会，更提不出改造社会的具体方案，最后又循回到《劝世良言》《原道救世歌》中的人性原罪说。他认为社会病症在于“世道乖离，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开出的药方则是“福大则量大，量大则为大人；福小则量小，量小则为小人”，就是指要做修身正己的“大人”（君子）。于是刚刚有所升华的“救世”思想，又蜕变为浅薄的“救人”思想，回归到道德说教、宗教说教的束缚中。需要明确的是，洪秀全提倡的惩富济贫、恤孤怜寡，不是现代意义上经济平等的思想，他所说的“公平正直”“天下为公”之世，也不是现代意义上人人平等的社会，而是像上古大同社会那样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有序社会。

就在洪秀全埋头宗教作品创作时，1845 年，美国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在广州设立“粤东施蘸圣会”。1846 年，在得知洪秀全自行传教的经历后，罗孝全大感意外，让其助手、中国教徒周道行写信邀请洪秀全前来襄助传教。洪秀全一直想和外国牧师交流基督教知识，以便验证自己在《劝世良言》中获得的启示。1847 年 3 月下旬，他和洪仁玕来到罗孝全的教堂，这是他们第一次直接阅读《圣经》，也是洪秀全唯一一次系统地接受西方基督教训练。

罗孝全对洪氏兄弟虔诚地前来“接受福音指导”感到满意，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他们所写的材料简炼明了，叙事清楚，令人满意，读后使我确信主已乐于感化他们的心，驱使他们抛弃偶像，来寻求救世主……现在他们每天都在这里学习，我几乎相信，是主送他们来这里的，果若如此，不用多久他们就会被吸收进教会……这两个人是我今年遇到的第一批问道者，在迄今我所听说过的所有中国人的经历中，他们所自述的那些经历是最令人满意的。”[②] 洪秀全似乎也被洋人传播的福音所感化，他很快提出受洗入教的请求。不过，后来因为竞争者的陷害，洪秀全受洗礼之事被取消并无限期推迟。大失所望的洪秀全感到前景渺茫，思虑再三，决计重游广西，查看上次布道的成果，继续传播自己的拜上帝思想，顺便寻访冯云山行踪。

与罗孝全短暂接触的三个月时间里，洪秀全的宗教思想也在潜移默化。他比较系统全面地

---

① 梁发：《劝世良言》,《近代史资料》总 39 号，第 100 页。

② 夏春涛：《有关太平天国的西文资料选辑》,《近代史资料》总 86 号，第 58-59 页。

了解了《圣经》知识，并在以后的宗教作品中尝试引用《圣经》。经过集中时间和精力的学习，受到罗孝全原教旨主义神学思想的熏陶，洪秀全后来极力反对和抨击偶像崇拜，并发动了一次次愈加激烈的捣毁偶像运动。罗孝全把洪秀全阻隔在基督教大门之外，洪秀全与传教士角色擦肩而过，这原本是个偶然，却使洪秀全的人生道路发生了转折，乃至对后来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1844 年 8 月，冯云山与洪秀全在广西贵县赐谷村分别后，独自一人深入桂平紫荆山区，随后经过两三年的惨淡经营，终于以紫荆山为中心，发展了两千多信徒，甚至有举家举族受洗礼者，其中就包括杨秀清、萧朝贵、韦正、卢六、石达开等骨干分子。他们自行集会礼拜上帝，外间遂有“上帝会”之名流传开来。故李秀成认为“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除了宣传敬拜上帝，冯云山还刻意神化洪秀全的教主形象，维护洪秀全的教主地位，包括渲染洪秀全丁酉年升天异梦，以至“每村每处，皆悉有洪先生而已。到处人人恭敬，是以数县之人，多有敬拜上帝者”。[①] 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理所应当地成了拜上帝团体的名誉教主和精神领袖，信徒们都翘盼洪秀全早日降临，一睹“洪先生”风采。

三、从激烈的宗教运动到确立反清思想

洪秀全第二次入桂，在表兄黄盛均家得知冯云山在紫荆山一带活动，立即动身前往寻找。1847 年 8 月 27 日，洪秀全与冯云山久别重逢，“不特欢喜与云山重会，而且欢喜得新信徒如此之多，尤乐于在其中宣讲圣道”。[②] 特别是洪秀全看到冯云山已使原本寥落、见不得前景的拜上帝思想在紫荆山区生根发芽，他欢欣鼓舞，实现人生抱负的志向重新燃起，思想悄然变化。从二次入桂，到揭竿而起，洪秀全同上帝会经历了从激烈的宗教活动发展到救助教友、团方团营的政治行动的转变。

第一阶段是激烈的宗教活动。洪、冯的再次会面揭开了广西传教的新一页。洪秀全虽然在广州罗孝全那里接受了数月的正规基督教学习，但要想符合当地人的心理需求，不可能照搬“洋教”，所以洪秀全改良了洗礼仪式、礼拜仪式、宗教戒律（制订“十款天条”）、祈祷文。他继续著书立说，“写书送人，时将此情教导世人，多有信从真道焉”，《原道觉世训》《太平天日》大约写就于此时。又有一般骨干分子帮衬，“四处代传此情，大有功力，故人多明醒”，上帝会势力迅速壮大，并以紫荆山为中心，向周边地区辐射。这里所说的激烈的宗教活动，主要是指洪秀全率领教众捣毁偶像的举动。广州学道之前，洪秀全虽主张弃拜偶像，但也仅是心理上排斥，语言上声讨。二次入桂后，洪秀全反偶像的思想和捣毁庙宇邪神的行为非常激进，可能与他在广州学道受罗孝全影响有关，但主要是受到如火如荼的教派势力发展的鼓舞，洪秀全极欲在思想上和行为上表达同传统偶像崇拜的决裂，从而确立上帝信仰的权威。入桂后仅两个月，洪秀全便策划并主持了远赴象州捣毁甘王庙的活动，他们捣毁了甘王神像，命“将妖眼挖出，须割去，帽踏烂，龙袍扯碎，身放倒，手放断”。[③] 不久，洪、冯又带人捣毁了三圣宫（雷庙）、土地庙，将紫荆山内的神坛社稷一概毁坏。

上述行动是从反对偶像崇拜、尊奉上帝独一真神这一教义出发的宗教行为，除了出于对唯一真神的信奉、建构上帝正当性外，行动本身还带有地方势力之间争夺政治权威的象征意义。

---

① 《忠王李秀成自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续编》）第 2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47 页。

②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 6 册，第 857 页。

③ 《太平天日》，《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 47-49 页。

清中叶以来，村落联盟成为国家推行保甲、团练的依托，成为基层社会最主要的社会结构。村落联盟依赖正统神明控制社坛神庙和祭祀仪式的参与权。广西浔州府环大瑶山区以种山烧炭为生的山民、流民，被土人排斥的“来人”（客家人），以及无缘进入村落联盟领导层的失意精英群体，他们都希望拥有自己的村社组织和神明来维护自身利益。这些平日里最虔诚供奉神灵，却又不被村社接纳或受到排挤的普通人群，最易接受一种新的信仰，而以异端信仰和仪式组成的上帝会满足了他们的需求。事实证明，上帝会的主要构成群体也是上述几类。洪秀全摧毁作为村社既有秩序象征的庙社神明，此举蕴含了同当地控制庙社神明的地方势力争夺地方权威和地域主义正当性的政治内涵。① 上帝会提出的人间“小天堂”理想满足了会众争取地域生存空间的实际需求，既确立上帝权威，又摧毁对手正当性，加深了会众的认同感，为激烈的宗教运动过渡到政治行动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以救助教友、团方团营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行动。激烈的捣毁偶像运动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使地方社会结构发生分化，上帝会和团练之间的冲突加剧。李秀成后来回忆说：“数县之人，亦有从之者，亦有不从，每村或百家，或数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从，或十家八家肯从，亦有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② 不从的人中，首先发难的是紫荆山石人村秀才王作新。1847 年 11 月，洪秀全返回贵县赐谷村。12 月 28 日，王作新带人拘拿冯云山，向江口巡检司和桂平县呈告，声称冯云山结盟聚会，不从清朝法律，践踏社稷神明，要求官府严拿正办。当时上帝会名义上是一个公开传播的宗教团体，又与“洋教”颇有瓜葛，桂平知县王烈不敢轻率判定，反认为王作新“捏饰大题架控”，有“挟嫌滋累”之嫌，下令“严提两造人证质讯，确情办理，以遏刁风而肃功令”。1848 年 3 月，洪秀全由赐谷村赴广州，拟通过罗孝全、周道行等人的门路，向主持弛禁天主教事宜的两广总督耆英求助，但耆英已调离广东。上帝会教众亦捐款集资营救，谓之“科炭”。5 月底，冯云山向浔州知府控诉，援引儒学经典中“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等 20 余处，证明“一切上帝当拜，古今大典，观广东礼拜堂悬挂两广大宪奏章，并皇上准行御批移文可查”，他“遵旨教人敬天，不意被人诬控”。浔州知府顾元凯示意新任桂平知县贾柱“分别究释具报，慎勿稽延滋累”，贾柱遂以冯云山“并无为匪不法情事”为由，下令从轻发落，将冯云山押解回籍管束。③ 冯云山在途中说服押解的差役，两人皈依上帝，同返紫荆山。

当时上帝会内部有不少会众利用神灵附体大搞分裂，其中就包括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传言。冯云山在紫荆山未作任何表态，不久折回广州，一是不能公开违拗官府将其递解回籍的命令，一是得知洪秀全在花县家中，可以找其商讨对策。但此时洪秀全因搭救冯云山不成，又离家重返紫荆山，洪、冯二人相左于途。

继 1848 年 4 月杨秀清利用当地“降僮”习俗假托天父下凡传言后，同年 10 月萧朝贵假称天兄下凡传言，两人联手，逐步控制了紫荆山及其附近地区的上帝会。洪秀全原本对人神沟媾的巫术非常反感，他在《原道救世歌》中把“邪术惑众犯天诛”的“巫觋”作“第五不正”，但回到紫荆山后，洪秀全居然认可了杨、萧代天传言的身份和地位。首先是内忧外患的上帝会亟待结束分裂动荡的状态，急需扶植其中一二人确定为真言，稳定人心。其次是杨、萧已经具有了一定实力，拥有相当力量的支持者。在冯云山缺席，洪秀全独木难支的情况下，洪秀全需要左膀右臂扶持。最后，最关键的是，杨、萧发布的类似“三八二一，禾乃玉食，人坐一土，作

① 参见唐晓涛：《神明的正统性与社、庙组织的地域性——拜上帝会毁庙事件的社会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11 年第 3 期。

② 《忠王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续编》第 2 册，第 346 页。

③ 方玉润：《星烈日记》，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 3 册，中华书局，1962 年，第 82–83 页。

尔民极”（“洪秀全为王”）的传言，[①] 丰富和发展了洪秀全十多年来苦心积虑编织的受命于天的神话，极大地便利了他由上帝教“教主”向天下“真主”的角色转变。这符合洪秀全利益，而冯云山缺少这样的手段。

从现存《天兄圣旨》看，之后“天兄”的每一次下凡传言，无不是在等待时机，朝着准备起事的方向努力了。洪秀全在 1848 年 11 月 19 日同“天兄”第一次对话时已经表露出“打江山”的意向。天王问道：“天兄，太平时军师是谁乎？”天兄回答：“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俱是军师也。洪秀全胞弟，日头是尔，月亮是尔妻子。”“太平时”就是起事、打江山时。“天兄”称洪秀全为“日头”，“日头”即“天王”“天子”，还指定了“太平时”的军师人选。洪秀全在和“天兄”公开对话前，应该已和杨秀清、萧朝贵接触并筹划确定了反清起事的目标。也就是说，在 1848 年冬天，洪秀全等人正式立意反清。1848 年 12 月中旬，“天兄”又指令洪秀全“但尔称王，不得称帝”。1849 年 1 月 1 日，“天兄”令上帝会元老、洪秀全表亲王玉绣、王盛通、王为政求“天父”恩准洪秀全早坐金龙殿（即“登基称王”），开始对上帝会的主干成员进行反清思想动员。但到 1849 年 2 月 13 日，“天兄”下凡指示洪秀全返回广东并可在“五月上来或冬时上来”时，洪、杨、萧仍然没有明确具体的反清计划安排（如后来的“团营”），因为“天兄”给了洪秀全一段有弹性的回乡省亲时间。[②]

在从激烈的宗教运动向准备起事的政治活动转变过程中，1847 年底到 1848 年夏的冯云山事件，被作为太平天国开国史上的大事，是上帝会由公开宗教团体过渡到秘密反清组织的转折点。直到冯云山被羁押，教众开展营救活动，上帝会仍然在坚持合法抗争手段。虽然在冯云山事件中，上帝会遭受骨干分子卢六瘐死狱中等直接损失，但官府敷衍了事，冯云山释归，上帝会公开活动如常，这一事件所造成的外部冲击和压力远没有达到“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地步。那么洪秀全为何突然萌生起兵造反的念头？这看似令人费解，实则有它形成的主客观条件。了解洪秀全的思想转变，不但要考察这一时期洪本人的实际行动，还应注意反映该时期洪秀全思想转变的文献——《原道觉世训》和《太平天日》。

《原道觉世训》写于 1847 年底到 1848 年初。[③] 与洪秀全以往宗教作品相较，《原道觉世训》加强了上帝权能恩德方面的论说，凡世界之一切、自然之一切、人类之一切皆上帝所主所赐，呼吁世人独尊上帝，不拜上帝是反天之罪。这些宣传在语言和内容上比之前的宗教作品更加激进，更为全面。《原道觉世训》富有特色的地方，是明确了上帝的对立面，即各种妖魔邪神的集中代表“阎罗妖”，号召“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这以犀利的语言在神灵层面强化了“真神”与“邪神”的对立，贬斥其他一切灵界诸神皆“邪神”，皆当批判。洪秀全在书中严厉批判了历代帝王信奉邪神和僭越称帝的错误，他指出：“皇上帝乃是帝也。虽世间之主称王足矣。岂容一毫僭越于其间哉！救世主耶稣，皇上帝太子也，亦只称主已耳。天上地下人间有谁大过耶稣者乎？耶稣尚不得称帝，他是何人，敢觍称帝者乎！只见其妄自尊大，自干永远地狱之灾也。”[④] 这里洪秀全并没有直称前代帝王和当下清朝统治者为“妖”，但有理由认为其中已有曲折影射的想法。走上反清道路后，洪秀全才把“阎罗妖”同清朝统治者明确结

① 《洪秀全来历》，《太平天国》第 2 册，第 689 页。

② 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5、10、12、14 页。

③ 《太平天日》明确提到洪秀全 1847 年在罗孝全处才读到《旧遗诏圣书》（《旧约》）和《前遗诏圣书》（《新约》）。参见《太平天日》，《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 46 页。这两种书在《劝世良言》中没有提及，《原道觉世训》首次出现了《旧遗诏书》等名词。这说明《原道觉世训》创作于洪秀全广州学道之后。1847 年秋冬间，正是洪秀全等激烈捣毁偶像之时，《原道觉世训》似为因应形势而作。1848 年初，洪秀全在花县省亲，也有安静环境创作的可能。1848 年 3 月以后，洪秀全奔波救援冯云山，风尘仆仆，加之上帝会内忧外患，似再无时间、精力和心情创作。

④ 《原道觉世训》，《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 17、22 页。

合起来："蛇魔阎罗妖邪鬼也，鞑靼妖胡惟此敬拜，故当今以妖人目胡虏也"，这就是太平军称呼"清妖"的由来。[①] 因此，可以认为《原道觉世训》是因应当时洪秀全、冯云山等采取更为激烈的捣毁偶像手段而作。它的部分内容虽然超越了《劝世良言》提供的素材和思想，并曲折地反映了洪秀全与现实政治秩序对抗的思想，但总体上看仍是一篇可以适应上帝会公开传教的宗教宣传品。

《太平天日》标明此书"诏明于戊申年冬"，也就是说在 1848 年冬，洪秀全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宣布了《太平天日》的主要内容。从书名看，"太平天日"即"太平王"，反清意图明确。从内容看，《太平天日》主要叙述了洪秀全丁酉年升天，在天上战逐妖魔，受天父天兄之命下凡斩邪留正，阅读《劝世良言》而敬拜上帝，外出学道、传道，拆庙斥妖等情事，是太平天国记载洪秀全升天异梦及洪秀全早年布道生涯最详细的一部书。

上帝教的基本教义是信奉"天父"（上帝）和"天兄"（耶稣基督）。早先对洪秀全"丁酉异梦"的描述虽然宣称洪秀全是受命救世，但没有明白告知教众洪秀全与上帝、与耶稣的关系。杨、萧代天言事后，不断神化洪秀全，明确了洪秀全是天父次子、天兄胞弟，天父天兄差其下凡，代天理事，做天下万国太平真主的身份。为了渲染这一身份转变，原来"丁酉异梦"的朴素情节就有必要重新附会政治需求而做出新诠释。

第一，塑造了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人性上帝。这时的"上帝"已不再是《原道觉世训》中泛化的"天"或自然的概念，而是有血有肉有妻有子和拥有无限权能的老人，是他指派洪秀全下凡打天下坐江山，所以教众应当完全服从，否则就是逆天反天。《太平天日》中"上帝"形象的塑造有了洪秀全有意为之的内涵。这已和洪秀全五年前因其异梦幻觉与《劝世良言》所载内容吻合而产生虔诚信仰有所区别，那时的他不许任何人更改《劝世良言》的原始记载。这也与洪秀全后来在造神运动中沉迷并产生精神依赖不同。

第二，塑造了一个下凡做"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的神性洪秀全。作为上帝次子、耶稣胞弟，洪秀全确立了与天父、天兄的血缘关系，他理所应当得到教众拥护，从而达到动员教众参加打江山事业的目的。富有神性的洪秀全，行走于人神之间的天父、天兄托降仪式，使神谕得到了活生生的实证，加深了处于迷茫中教众们的认同感。

第三，为了调整内部关系，稳定人心，相应地形成了"上帝小家庭"，其中俗世中人构成了上帝会领导核心层。所以，《太平天日》虽然没有直白的政治号召，但它提供的素材完全超越了《劝世良言》，是一部完整的宗教神话，同时是一篇反清政治宣言。《太平天日》的创作完成，标志着洪秀全的早期思想，从迷恋功名、道德劝善、宗教救世，已经曲折地过渡到蓄志反清的阶段。

四、走上反清道路后的思想变化

走上反清道路后，洪秀全的思想较之前有所修正和补充。

（一）强调斩邪留正和杀妖

在早期所写的宗教作品中，洪秀全也宣扬宿命论和天命观，如"乐夫天命"，"天生天养和为贵，各自相安享太平"，"总之贫富天排定"，"知命安贫意气扬"，主张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反对彼此戕害，"人自相残甚恻哀"，"兽畜相残还不义，乡邻互杀断非仁"。[②] 但此时，他

① 《颁行诏书》，《太平天国》第 1 册，第 162 页。

② 《太平诏书》，《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 11、12、13、16 页。

认为基督教宣传的教义“过于忍耐或谦卑，殊不适用于今时，盖将无以管镇邪恶之世也”，① 故反复提出“邪魔敢冒天恩者，该诛该灭无论”，“至于世间所立一切邪魔该杀”。② 可以认为洪秀全在《太平天日》里所说的“邪魔”不仅是指泥胎木塑，主要抗争指向是清朝最高统治者和大小文武官吏。从“不杀”到“杀”的思想发展，适应了洪秀全号召民众起身反抗的现实需要。

（二）否定现实统治秩序的思想基础——儒家文化

洪秀全早期的宗教作品也把孔子、孟子等奉为道德楷模，讴歌其正面形象，为论证宗教观点穿插征引儒学经典，以此驳斥拜上帝是“从番”之论。尽管上帝会要破除包括孔子在内的一切偶像崇拜，“丁酉异梦”中也有谴责孔子的情节，但洪秀全并不否认儒家学说的存在价值，对孔子也不乏敬意。而《太平天日》丰富和夸大了这一情节，改为对孔子鞭笞和斥责。萧朝贵假“天兄”传言：“他（孔子）从前下凡教导人之书，虽亦有合真道，但差错甚多。到太平时，一概要焚烧矣。”③ 这奠定了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出台全面焚禁古书政策的理论基调。④

（三）拜上帝思想的本土化

拜上帝信仰的源头虽然是西方基督教，但自创立之始就被洪秀全赋予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民间宗教色彩。这是拜上帝思想易于被广西下层民众接受，并最终以上帝旗帜聚拢民心，掀起惊涛骇浪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一是中国化的“上帝”。洪秀全一开始接受“上帝”概念，便与中国先秦典籍中的“天”等同，洪秀全说“盘古以下至三代，君民一体敬皇天”，⑤ 只是秦汉以后人们被妖魔迷心，才中断了上帝信仰，所以他认为敬拜上帝是中国传统，就是敬天拜天。而中国民间原有敬畏上天的传统，视天为命运之主宰，这有利于将拜上帝思想和传统民间信仰结合起来。后来，上帝已由一个宽泛的概念转变为具有人格的天下大共之父，甚至他的体貌特征都具有中国人的形象。洪秀全不能理解基督教所说的“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新约·罗马书》第 8 章第 14 节）这类形而上的伦理关系。他只能按照中国传统的血缘亲情和人伦关系重新解释上帝与世人关系，构建了一派其乐融融的上帝小家庭和天下大家庭。这个变化，反映了洪秀全从纯粹确立上帝权威，到借上帝确立他本人是真命天子地位的思想转化。

其二是中国化的教义与仪式。基督教上帝纯灵，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洪秀全不能理解上帝无形说，浔州下层民众更难理解。因此上帝教的天父、天兄和圣神风拥有三个独立神格，圣神风成了凡间的杨秀清，天父、天兄可以随时降附杨秀清、萧朝贵之身发声，处理凡间一切事务，这显然迎合了下层民众敬拜活灵活现之神的需求。以鬼神附体传言在民间教门中屡见不鲜，天父、天兄传言直接借鉴了广西浔州的降僮术，它的本质同巫觋并无区别。洪秀全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作品，同《劝世良言》一样，把“天堂”作为灵魂享福的地方，但为了适应打江山的政治目标，洪秀全许诺要在人间建立肉体享福的“小天堂”。《圣经》是基督教的绝对真理，所以它的任何教派只能在解释和运用上有分歧，但不能对《圣经》本身有任何怀疑。洪秀全虽然仍尊崇《圣经》，但把宣扬的重点放在记载天父、天兄圣旨和下凡活动，洪秀全升天受命及下凡作主等自我塑造的内容，即太平天国统称《真

①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 6 册，第 864 页。

②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 20、42 页。

③ 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第 7 页。

④ 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参见 Liu Chen, “Anti-Confucianism: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Cultural Policy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and Its Ideology Essence,” *Cultural and Religious Studies*, Vol. 10, No.5 (May 2022), pp.219−225。

⑤ 《原道救世歌》，《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 10 页。

约》的各种书籍，其中就包括《太平天日》。这些已不是基督教经典，而独作上帝教经典，其内容体现了洪秀全对《圣经》的修改和利用，如他发明的上帝家族说、三位分立说、小天堂说和上帝五次大怒说（把上帝差遣天王作主救人和东王下凡赎病分别作“大怒”），① 这自是迎合了洪秀全的政治需要。

在宗教仪式上，洪秀全在罗孝全教堂见过正规洗礼和礼拜仪式，他对此作了本土化改良，与基督教、犹太教的仪式大相径庭，却与中国民间祭祖敬神仪式十分相像。上帝教还用猪肉祭拜上帝，而在犹太人眼里吃猪肉的是异教徒。在宗教节日上，洪秀全全然不提基督教节日，后来干脆发明了“天历六节”。② 在宗教纪律上，上帝教将《旧约》“摩西十诫”改良为《天条书》“十款天条”，自确立打江山目标后，洪秀全即以此宗教纪律约束教众，不再单纯以宗教道德规范教众了。

其三是中国化的救世观。《劝世良言》基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宣扬人性“原罪”和“救赎”。洪秀全在《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中虽没有直接提及这两个概念，但他从“原罪”出发论证人人都有拜上帝的权利，从耶稣“赎罪”功绩论说人人都当拜上帝的义务，提倡改造人性，要求人们加强人格和心灵修养，加强社会道德约束，以达大同社会。虽然洪秀全没有提出改造现实社会的具体方法，但他提出了对未来社会的愿景。这说明洪秀全并没有全盘接受《劝世良言》，而是结合现实以及自身理解和经历，对《劝世良言》中若干核心内容做了改造。《劝世良言》中没有任何救世思想，洪秀全早期一些作品，与其说是宣扬“救世”，不如说主旨是“救人”。由“救人”到“救世”的思想发展，是洪秀全思想的一个巨大转变。

此外，上帝教的救世观与传统中国民间宗教相似。例如，明中叶以后白莲教宗信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真言。“无生老母”被奉为生育人类的至高女神，这和洪秀全宣扬的天父上帝是天下大共之父异曲同工。白莲教宗教义主线是明暗两宗斗争，无生老母先后派燃灯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去做三际凡间统治者，最终弥勒降生，战胜黑暗，建立千禧年福境。上帝教大力渲染现实苦难和未来世界的美好，强调自上帝真道失传以来世上一团漆黑，但“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信奉上帝者可“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③ 与此观点对应的是发布入教避劫之类恐怖预言，如起事之前洪秀全连续发布三条预言：“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④“在道光三十年（1850），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将得救，其不信者将有瘟疫；”“过了八月之后，有田不能耕，有屋没人住。”⑤ 果然，广西有数县发生瘟疫并有土人来人相斗相杀，上帝预言得到验证，拜上帝者愈众。这是中国民间宗教惯用的传播手段。将世人划分为信教的“原人”和不信教的非“原人”，区别对待，属于两极化救世观，而基督教宣扬的是上帝关爱整个人类的普世性救世观。

上述内容也是洪秀全的思想同《劝世良言》所反映宗教思想的差异。洪秀全的拜上帝思想自诞生之日起，就深深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烙印。在洪秀全早期思想中，最初与基督教深刻结合的是影响洪秀全前半生至深的儒家文化，他还用佛教、道家术语和思想阐发基督教理论。随着客观形势变化，洪秀全拜上帝思想的内容和形式体现为对《劝世良言》、《圣经》、农民平均主义思想、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民间宗教、江湖文化的大融混。融混过程中经过不断的修改、加工、补充和完善，拜上帝思想的本源中国传统民间文化色彩更加浓厚。特别是上帝教一

① 《圣经》中上帝三次大怒为：上帝怒降洪水与诺亚方舟故事，上帝救以色列人出麦西国，上帝遣耶稣下凡救世。

②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新历》，《太平天国印书》下册，第 721 页。

③ 《原道醒世训》，《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 16 页。

④ 《忠王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续编》第 2 册，第 346 页。

⑤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 6 册，第 867 页。

旦和降僮等民间巫术结合起来，传统民间文化便超越了基督教和儒家文化，成为上帝教的主流文化。归根结底，这来自于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等创始人的“民间”色彩，他们的思想不同程度地凝聚在拜上帝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之中。

《劝世良言》不可能使洪秀全走上造反之路。《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中宣扬的忍让、安贫乐命、不行杀害、捐妄念、脱俗缘，不利于发动民众起身反抗。这里并不是否定洪秀全早期宗教作品的积极意义，因为洪秀全的思想发展到反清一定要经过一个循序渐进、曲折衍变的过程，而正是早期的思想异端为洪秀全反清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素材，并奠定了反清思想的理论基础。正是洪秀全修改和补充了原先的某些思想，特别是使拜上帝思想逐渐本土化、中国化，更多地符合中国下层民众的心理需求，更易于被下层民众接受，从而增加了民众的认同感。需要注意的是，使拜上帝思想本土化、中国化，除了便于在下层民众中传播这一初衷，核心利益还是服务于现实政治需要。

洪秀全反清思想的形成，并非历史的偶然，有它形成的主客观条件：

第一是社会生态的恶化。广西地处西南边陲，地瘠民贫，加上吏治腐败，天灾人祸，民生穷蹙，故民变蜂起，盗匪横行。1786 年底到 1788 年初天地会林爽文在台湾发动起事后，清政府调派大军镇压，紧接着就在台湾、福建、广东大举查拿天地会，花了十年时间，当时天地会会众为了躲避厄运，多半逃到广西，投奔早先迁徙入桂的亲友藏匿栖身。嘉庆、道光时，广西天地会不断起事，逐渐壮大。鸦片战争后，广东数万被裁撤的壮勇（其中不少是天地会成员）生活无着，纷纷入桂啸聚山林，加上广西本省土匪游民膨胀，使拜会结盟现象迅速滋蔓，至 1847 年前后大局糜烂，雷再浩、陈亚贵、李沅发等相继聚众抗官。广西还是汉、壮、苗、瑶等多民族聚居区，民风剽悍，民族矛盾尖锐。加上土客械斗愈演愈烈，又增添了新的动荡。尽管广西社会冲突异常激剧，清朝统治力量在此却相对薄弱。广西全省包括绿营和土兵在内常备军不足四万，且主力集中在桂林、柳州等大城镇，应对善于流动作战的土匪、会党，往往顾此失彼，加之财政亏空，兵饷两缺，多数官员不安于位，敷衍塞责。时人慨叹：“民不聊生，官亦不聊生。”① 为应付危局，广西方面开出的“良方”是由各地乡绅倡办团练。在一定程度上，广西地区如火如荼的天地会起事和愈演愈烈的土来之争，牵制了清政府的精力和兵力，策应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准备和兴起。

桂平县紫荆山区的社会矛盾尤为尖锐，上述情况均交织发生于此，杨秀清、萧朝贵将富户韦昌辉所在的金田村打造为上帝会的中心基地。在广西遍地烽烟的情形下，已拥有数千教众、极力扩张势力的上帝会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在土来之争中，上帝会的参加者主要是“来人”，后来发展起来的太平天国运动，因此又被称作“客家运动”；在官方和天地会的争斗中，有的天地会力量和上帝会一直保持联络，最初上帝会对吸纳天地会成员也持相对开放态度。这些都会引起当地士绅的恐惧和敌视。冯云山事件无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地方士绅已经将结盟拜会、蓄意谋反的罪名加诸上帝会了。之后，双方矛盾和冲突不断升级。李秀成回忆说：“自教人拜上帝之时，数年未见动静。自道光廿七、八年之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② 一个“逼”字生动形象地说明上帝会走上反清之路的外在条件。激烈的社会冲突、严峻的政治现实必然对一直苦苦思索救世途径的洪秀全有所触动，从而促使他加快造反步伐。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在洪秀全尚未萌生反清意向

---

① 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 2 册，中华书局，1962 年，第 6 页。

② 《忠王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续编》第 2 册，第 347 页。

之前，广西全省已是一片火海，局面已然失控。现存文献所反映的洪秀全思想转变与反清思想确立的时间点恰好与广西局势崩溃的时间相吻合，这从侧面说明正是空前激烈的社会冲突，才驱策洪秀全最终走上反清之路。

第二是洪秀全主观认识发展变化的产物。首先，洪秀全早期思想本身包含着危险的异端意识。在一定情势下，异端思想有可能转化为同正统思想的对抗。其次，洪秀全的宗教思想逐渐从“救人”演变为“救世”。尽管他的早期思想在本源上属于道德劝世，却已表达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批判。最后，洪秀全的思想一直充斥着反满色彩。在《百正歌》中他就表达了“正可行蛮貊”的夷夏之分，这是洪秀全骨子里传统华夷观的体现。① 洪秀全的反满意识还受到同时期天地会活动影响，但要比天地会的反满思想更加激进。他走上反清道路后强调：“我们可以仍说反清，但不可再说复明了。无论如何，如我们可以恢复汉族山河，当开创新朝。”② 太平天国以兴汉灭满旗帜号召汉人声讨清朝罪行，宣称替天行道，是为上帝收复失国，宣传政治抗争的正义性和神圣性，就是基于这种华夷意识。当然洪秀全强烈的反满思想可能也与其客家出身的身份背景有关。据传，洪秀全、冯云山的先人曾应召从祖籍嘉应州迁至花县参加客家起兵反清。客家先民的多次迁徙都缘于边疆部族入侵，他们在兵燹中历尽磨难，付出惨重代价。客家人的民族意识历久不释，对外族入侵和统治尤为反感。

我们看到洪秀全二次入桂后，思想变化较大且愈发激进，这与他在广州罗孝全处阅读到《圣经》原本有一定关系。《太平天日》的思想核心有“神魔斗争”“斩邪留正”“天国降临”等，这些内容充分体现在《新约全书》第四部分《启示录》中。《启示录》中的宗教情境与洪秀全所处的现实情境极为相似。《太平天日》中的一些情节，或能直接在《启示录》中找到依据，或是对《启示录》相似情境的误读，像《启示录》中也有千年王国是地上王国的说法。③ 这说明《启示录》中的神话故事、神秘预言确曾引起洪秀全的关注、共鸣和吸纳，借以证明自己身份的合法性和神圣性。所以，洪秀全二次入桂后的思想变化，除了当时激化的社会生态和上帝会所处的紧张环境外，洪秀全对《圣经》，特别是对《启示录》的附会式阅读和理解，并以此主观认识指导抗争实践，起到了重要作用。

洪秀全屡试不第，广州入教受洗被拒，广西传教受挫等坎坷经历使他产生了对现实社会的极度不满情绪，紫荆山上帝会组织的蓬勃发展给予他自认受命下凡斩邪留正的理想以鼓励和勇气，这些均是洪秀全转向矢志反清的主观条件。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社会危机中，有人寄希望于君明臣贤，有人主张改革弊政，有人以道德劝善，有人问心宗教，有人则走向了改朝换代的道路。各有各法，各图振衰起敝，挽狂澜于既倒。但各条道路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洪秀全从醉心功名、立志做官，到道德劝善救人、宗教救世，再到逐渐萌生打江山帝王抱负的思想演变历程，深刻诠释了这一立论。1851 年 1 月 11 日，2 万多会众集聚金田，誓师庆贺起事成功暨洪秀全 38 周岁生日，定国号“太平天国”。④

---

① 《百正歌》,《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 14 页。

②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 6 册，第 872 页。

③ 周伟驰:《太平天国与启示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23–184 页。

④ 历史上不存在一个后人理解的爆发于某日的“金田起义”事件。太平天国官方提出的“金田起义”代指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端或起始。洪秀全、李秀成等高层将 1850 年夏秋各基地教众分别扯旗团营的举动均视作“起义”。金田地区的扯旗团营在十月初一日，所以很多公私文献记载洪秀全于庚戌十月起义。洪秀全认为，太平天国开国日即各地教众会聚金田的“团圆日”——庚戌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 年 1 月 11 日）。《天父诗》第 349 首载“凡间最好是何日？今年夫主生诞日。天父天兄开基日，人得见太平天日”（《太平天国》第 2 册，第 480 页）。但该日不具宗教意义，又与天王寿诞同天，按例须祝寿，故洪秀全不把开国日作节庆纪念，历代王朝也没有以开国日作国庆节的前例。

五、余论

在洪秀全的早期思想中，拜上帝思想是主导层面。拜上帝思想在广西地区的成功传播主要得益于它本土化的宗教思想迎合了人们畏祸求福、入教避劫的现实需求，符合中国农民的务实性格，激发了人们对未来均匀饱暖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独尊上帝的信仰还统一了起事者的思想意识，加强了组织纪律，强化了他们推翻旧秩序旧权威的信心和决心。在起事者眼里，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是主宰一切的真神，完全可以庇护他们生享天福，死升天堂。上帝信仰激发出的排山倒海般的精神力量，使太平军在打江山过程中无所畏惧，至死不渝。定都南京后，太平军总兵力不过十万，却北伐、西征、东讨，行迹遍及十八省，攻克六百余城。就思想传播所起到的组织和动员成效讲，在太平天国前期，拜上帝思想无疑获得了成功。

无论是清朝统兵大员，还是地方士子文人，他们都看到了宗教对太平军士气的影响。起初主持广西军务的钦差大臣赛尚阿就此向朝廷奏报心中疑惑："所过地方向有愚民陆续煽聚。一经入会从逆，辄皆瞀不畏死，所有军前临阵生擒及地方拿获奸细，加以刑拷，毫不知所惊惧及哀求免死情状，奉其天父天兄邪谬之说，至死不移。睹此顽愚受惑情形，使人莫可其哀矜，尤堪长虑。"① 文人陈徽言说："（太平军）或临阵，或患病，举凡一切事，皆对天祈祷，口喃喃'求天父默佑，所谋遂意'，祝毕，赴汤蹈火，在所不顾。"②

天京事变后，太平军的宗教热情大为减弱，最终信仰危机爆发，叛降事件屡屡发生。太平天国后期宗教意识淡薄，主要原因是拜上帝思想自身长期缺乏内在平衡机制：

第一，上帝教教义日趋空洞僵化。作为指导太平军思想的意识形态，它必须顺应时势，切合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内涵，关心呵护信众。但洪秀全晚年耗尽精力所做的宗教工作不过是推行个人崇拜，强化渲染他君权神授、奉命下凡的真命天子地位。对一般太平军而言，"父子公孙""爷哥朕幼"的空洞说教已全然不提军兴时的利益许诺和蓝图构建，丝毫没有新意，难以继续产生吸引力。而洪秀全至终也没有找到问题症结，他自我陶醉，反复絮叨陈旧的宗教情节，一味信识"天功"，把太平军将士流血牺牲换来的功业说成是天父天兄大显权能，说成是他在梦中得天父天兄相助轻易而得。这不但忽视群众利益，而且蔑视群众力量，脱离现实，使太平军将士心寒、反感。人们再也不肯继续无怨无悔地为洪家天下卖命。

第二，某些教义自身严重抵牾。上帝教教义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宗教与世俗关系混淆，集中表现在天父、天兄下凡传言与洪秀全绝对权威的冲突。洪秀全致力打造的是自己的神性，却在现实社会中受到杨秀清和萧朝贵的权力制约，彼此间的矛盾非以血流漂杵惊心动魄的内讧事件来解决不可。无论哪一方获胜，都会暴露上帝小家庭宗教思想的破绽。可以想见作为天父化身的杨秀清之横遭劫难，给太平天国上下带来的心理震撼。洪秀全在天京事变后很快意识到教义的漏洞，但他无法找到正确处理宗教与世俗关系的方法，只好不断神化自我。实质上，造神运动已经违背了上帝教独尊上帝的核心教义，洪秀全的抱残守缺，出尔反尔，让太平天国军民逐渐从宗教的麻醉作用中清醒过来，认清了上帝的虚幻。

第三，吏治腐败、内部政争和人心离散、信仰危机互为因果。太平天国始终渲染天父权能，声称："我们今日天父天兄作事，欲使妖魔生即生，欲使妖魔死即死，略显权能，即可扫荡妖氛，

---

① 《赛尚阿等奏洪秀全并非朱九涛广西亦无李丹折》，咸丰元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第 315 页。

②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第 4 册，第 601 页。

四海升平。”① 洪秀全更是谈天说梦，自信“朕睡紧都做得王，坐得江山”。② 但是，现实是严峻而残酷的，太平军起兵几年后，非但“清妖”未灭，都城天京却屡被围困，上帝许诺的小天堂迟迟不能兑现，“天国迩来”未来，“太平一统”未至，洪秀全只能宽慰信众“天下太平漫漫来”。③ 宗教虚幻无法满足切实利益，人们转而投机现实，私欲膨胀，醉心升迁，政争日炽。太平军初期兵少而战力强，后期兵众而战力弱，只能以众敌寡，靠大兵团阵地战维系战局，这与拜上帝思想的弱化有直接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拜上帝思想丧失信众，即意味着太平天国失去民心。

References

Cui Zhiqing, Hu Chenyou. *Hong Xiuquan pingzhuan* (Commentary on Hong Xiuquan). Nanjing: Nanjing daxue chubanshe, 1994.

Wang Qingcheng. *Taiping tianguo de lishi he sixiang* (History and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2010.

Xia Chuntao. *Tianguo de yunluo: taiping tianguo zongjiao zai yanjiu* (The fall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a re-examination of the religion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2016.

Zhou Weichi. *Taiping tianguo yu qishilu*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and revelation).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2013.

The Rise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A New Study Based on Hong Xiuquan’s Early Thought

LIU Chen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sdbzliuchen@126.com)

Abstract: “Ding You (1837) Vision” which was recorded in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ficial books mixed with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previous dreams made by Hong Xiuquan and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in the new situation, which was away from the original facts. Furthermore, there is mutual proof of the significance of divinity in various documents. *Taiping Tianri* written in the winter of 1848 is a complete religious myth and at the same time an anti-Qing manifesto. Only then did Hong Xiuquan and his party formally set out to oppose the Qing Dynasty. Hong Xiuquan’s failure to pass the examinations, being refused to be baptized in Guangzhou, missionary frustration in Guangxi and other experiences made him extremely dissatisfy with the real socie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Zijingshan God's Church encouraged him to acknowledge himself to be ordered by God to come down to earth to cut off the evil. Especially, after the second entry into the Guangxi in 1847, Hong Xiuquan changed a lot subjectively. The time points of Hong Xiuquan's ideological chang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ti-Qing ideology as reflected in the existing documents coincide with the time of the collapse in Guangxi,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unprecedentedly intense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drove Hong Xiuquan to finally embark on the way of anti-Qing.

Keywords: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the Taiping Army, Hong Xiuquan, God-worshiping ideology

---

① 《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印书》下册，第 521 页。

② 《天王收得城池地土梦诏》,《太平天国续编》第 3 册，第 74 页。

③ 《万国来朝及敬避字样诏》，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 年，第 61 页。